

# 明朝中后期耶稣会士与 澳门汉学活动勾沉

叶 农

〔摘要〕本文介绍了在明朝中后期，耶稣会士在澳门进行汉学活动的情况。有四个部分：1. 是在澳门撰写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2. 在澳门发出书信，这些主要内容有：(1) 谈论在华传教问题，包括传教策略、教区情况等；(2) 有关汉学著作的写作情况；(3) 有关“礼仪之争”；(4) 介绍中国情况、研究中国历史等；3. 撰写有关中国传教情况的报告及其他内容；4. 进行其他的汉学活动：(1) 进行科学调查；(2) 研究中国的历史与宗教；(3) 绘制中国地图。

〔关键词〕汉学 明朝 澳门 耶稣会士

〔作者简介〕叶 农，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32。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正式确立，其公认的标志是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11月创设汉语教授席位。但汉学作为学术活动，却远在汉学这门学科正式确立以前在世界许多地区就展开了，正是通过世界各地大量的汉学活动，才促进了汉学的正式确立。澳门曾是早期汉学活动中心之一，其汉学活动在明代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不久就开始了。到明朝末年，澳门的汉学活动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关于明代澳门汉学活动情况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一些论文及论著成果。<sup>①</sup>但从整体上来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因此，本文将散落在文献中有关澳门明代汉学活动的资料收集起来，借此重现澳门当时汉学活动的情况。

从天主教传入中国的16世纪后期到明末的17世纪中叶，是澳门汉学活动的发轫时期。<sup>②</sup>此时，在澳门活动的汉学家主要是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因执行其传教策略而开始注意和研究中国文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从客观上开始了最早的汉学研究活动，而澳门则是他们进行这种活动的基地之一。但这种汉学研究活动，还不是主观进行的，只是作为传教的手段而已，故是澳门汉学活动的开创时期，或者是不自觉时期。他们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一、撰写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

当时，由于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不深，因此，急需一些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故那时的汉学著作，只是一些对中国情况的简单介绍，加上当时的传教士们的汉学造诣并不深，他们不可能写出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度研究的学术著作，而只能通过观察来写出一些介绍性著作。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将其在汉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抹杀，它们毕竟开了进行汉学研究活动的先河。这些著作及著者有：

若昂·德·埃斯科巴尔。葡萄牙人。他是吉尔·德·戈伊斯来华使节团的文书，1563年到达澳门。1565年，他写了《若昂·埃斯科巴尔关于至高至强之塞巴斯蒂昂国王派往中国的使节团的评述》。该《评述》对研究澳门的早期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罗理路（Rui Manuel Loureiro）称：“他大概于1563年乘坐特使的船自果阿来到澳门。他多次访问了广州城，并目击了有名的1564年对中国海盗作战之役。他的证词，不知为何仍未出版，对于彻底弄清天主圣名之城早年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sup>③</sup>

佩德罗·戈麦斯〔亦译葛安德〕（Pedro Gómez, 1535-1600年）神父。耶稣会士，西班牙人。1579年抵澳门，曾在此停留过。<sup>④</sup>据（法）荣振华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称“荣书”）载：“他与罗明坚1581年用汉语写了一部基督教教理书。”<sup>⑤</sup>

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 1538-1606年）神父。耶稣会士，意大利人。1578年9月6日首次到达澳门。他作为巡视员，认为入华传教士学习和掌握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是重要的。他是一位提倡和促进入华传教士进行汉学活动的重要人物。1590年，他用西班牙文写成《关于日本使节朝拜罗马教廷的对话》（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在澳门出版。该书由孟三德（Duarte de Sande, 1531-1600年）译为拉丁文。据“费书”载：“《日本使节赴罗马教廷日记所载对话记要》，用拉丁文及日本文写成，四开本，载《中华帝国的澳门商埠》，一五九〇年。”<sup>⑥</sup>该书于1592年被带回欧洲。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从中摘取有关中国的部分译为英文，名为《一篇出色的关于中华帝国及其社会阶层和政府的论文》（An Excellent Treatise of the Kingdom of China, and of the Estate and Government thereof），编入《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交通和发现》1599年的第2版。

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年）神父。耶稣会士，意大利人。1579年7月20日左右到达澳门。他遵照范礼安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应该学习中国话及中文”<sup>⑦</sup>的指示，克服重重阻力，努力学习汉语。他是一位很有毅力并有极高天赋的传教士，到达澳门后2年4个月，便能认识15000个汉字，初步可以读中国的书籍，3年多后，便开始用汉语来写作了。罗明坚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他的汉语能力的提高大大推动了他的传教事业。他在澳门建立了传道所——“经言学校”。<sup>⑧</sup>这是明代中国较早的传教机构，或许是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sup>⑨</sup>罗明坚是西方汉学“传教士汉学时期”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广东肇庆时，与利玛窦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外语字典——《葡华辞典》，在返回欧洲后又把《四书》中的《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了拉丁文，第一次在西方出版了详细的中国地图集——《中国地图集》，而且，他还在澳门写出了第一部欧洲人以汉语所写的著作——《天主圣教实录》，它是一部基督教教理书。据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下称“徐书”）载：“彼（即利玛窦）既得初步之功，亦著书立说，藉哲理及科学以阐明圣教之真道；其第一书为罗明坚之《天主实录》（Vera et evrb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sup>⑩</sup>据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称“方书”）载：“他是首先以汉字汉文撰写天主教教义的书。这部书名为《天主圣教实录》。”<sup>⑪</sup>据罗明坚自己在澳门给麦尔古里神父的信中说：“我希望不久对中国话能够运用自如，而后用中文撰写要理等书，这是为归化他们必须的步骤。”后来，又在肇庆写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说：“目前我已撰写了几本要理书籍，其中有《天主真教实录》（Docerina）、《圣贤花絮》（Flos Sanctorum）、《告解指南》或《信条》（Confessionario）与《要理问答》（Catechismo）等。”<sup>⑫</sup>费赖之认为该书与《要理问答》为同一书，只不过书名不同而已，据张西平先生的研究，应为两本不同的书。<sup>⑬</sup>该书应为曾与佩德罗·戈麦斯合作编写。<sup>⑭</sup>该书应为欧洲人在澳门出版的第一本书。据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ira）著《四百周年——澳门印刷业》（下称“文德泉文”）称：“然而，是欧洲人1585

年在澳门出版了第一本书，在瓦利格纳诺（Valignano）[即范礼安]神父的印刷社到达之前是米盖尔·罗吉尔（Miguel Ruggieri）[即罗明坚]的一本中文版《教义问答》，名为《真正的认识上帝》，在封面装饰的一个椭圆形中是耶稣会的标志：IHS。……几年中当了教师，神父印刷了中文版的《教义问答》很快传入中国，当他和葡萄牙人来到广州时，已满载荣誉。”<sup>⑥</sup>

利玛窦（Mathieu Ricci, 1552-1610年）神父。耶稣会士，意大利人。1582年8月7日到达澳门，并立即根据范礼安的批示学习汉语。在传教过程中，他感觉到需要研究中国文化。他的汉学著作有与罗明坚一起参与编辑的《拉中词表》。据文德泉文载：“杰·米·布拉卡（José Maria Braga）增补一段说到利玛窦、罗吉尔神父也参加了《拉中词表》的编写，在瓦利格纳诺神父（即范礼安）的指导下，第一版于1585年在澳门印刷。”<sup>⑦</sup>他的《天主实义》，曾多次在澳门重印。据“费书”载：“《天主实义》，一名《天学实义》，一五九五年初刻于南昌，一六〇一年校正重刻于北京，凡二卷。……范礼安神甫曾将此本三次重刻于澳门。”<sup>⑧</sup>据“方书”载：“……他的《天主实义》，一名《天学实义》……一六〇四年译为日文，曾在澳门重印三次。”<sup>⑨</sup>其《语法》等，1588年和1599年在澳门出版。据文德泉文载：“安·贝莱德神父（Henri Bernard）还提到过另外两本由澳门耶稣会传教士印刷的著作，一本是《语法》1588年，另一本是利玛窦（Mateus Ricci）的《对话》1599年。”<sup>⑩</sup>

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神父。耶稣会士，葡萄牙人。1585年7月31日到达澳门。他在澳门将范礼安的著作译成了拉丁文，见上述。

王丰肃（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 1566-1640年）神父。耶稣会士，意大利人。1604年到达澳门。他在澳门的著述有：据“费书”载：“（一）《教要解略》，一作《圣教解略》二卷，一六二六年初刻于绛州；一九一四年重刻于土山湾。是编撰于澳门。……（三）《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七卷，一六二九年刻于绛州，亦为谪居澳门时之撰述。”<sup>⑪</sup>

陆若汉（João Rodrigues Tçuzu, 1561-1634年）神父。耶稣会士，葡萄牙人。1614年抵澳门。在来华前，他曾在日本著书讨论中国文化问题。据“方书”载：“但他来中国之前，曾在日本传教，有语言天才，……撰有《日本天主教史》，未完稿。其第一册第二卷第八章论日本与中国之数学；第九章论中国与日本之天文；第二册第一卷第一章拟研究圣多默是否来华传教问题，并检讨泉州的古代教友，第二章论十字教教友；第三册第一章为中国传教史。”<sup>⑫</sup>

## 二、在澳门发出书信

耶稣会士来华后，开始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融入程度以及对了解中国深度是以往来华的任何外国人无法相比的，他们称得上是当时的“中国通”。而这些“中国通”又长于著述，勤于写信，于是，有关中国的信息便通过他们的著述、书信或报道传到西方。西方人由此才开始真正地认识中国，西方的汉学也由此才得以奠基。故传教士写信成为了澳门汉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探讨汉学活动时，不能忽视传教士的书简。在澳门发出的这些书信，限于各种条件，只知以下内容。

### （一）谈论在华传教问题，包括传教策略、教区情况等

奥尔甘蒂诺·涅奇-索尔多（Organtino Gneccchi-Soldo, 1532-1609年）神父。耶稣会士，意大利人。1568年在澳门。据“荣书”载：“我们之所以提到此人是由于他于1569年10月29日和1570年从澳门发出了有关中国传教区的书简。”<sup>⑬</sup>

利玛窦。曾在澳门发出一封信，谈在华传教的策略。据“费书”载：“一五八二年四月范礼安神甫召之赴澳门，是年八月抵澳门，立时研究华语，次年随罗明坚神甫赴肇庆。（一五八三年九月。）玛

宴居肇庆时，因民变几受害，然能乘时研究认识中国之精神与性质。不久感觉传道必须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既附，信仰必定随之。（一五八三年二月十三日澳门信札。）<sup>②</sup>

孟三德。在澳门发出过一封信。据“费书”载：“一五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澳门致耶稣会长书报告中国新传道会事，载《日本和中国信札》（八开本，罗马、桑奈蒂，一五九一年）及诸译本中。”<sup>③</sup>

梅尔肖尔·莫拉（Melchior Mora, 1545 - 1616年）神父。耶稣会士，西班牙人。据“荣书”载：“我们提到他是由于他于1589年7月20日从澳门发出了有关日本和中国传教区的书简。”<sup>④</sup>

米格尔·苏亚雷斯（Miguel Soares, 1552 - ?）神父。耶稣会士，葡萄牙人。1597年11月2日起，他在澳门任日本（和中国）传教区的司库。据“荣书”载：“他1599年10月26日自澳门发出了致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Auviva）的一封有关中国传教区的书简。”<sup>⑤</sup>

穆其奥·罗基（Muzio Rocchi, 1572 - 1605年）神父。耶稣会士，意大利人。据“荣书”载：“1601年从果阿出发前往澳门，他于1602年1月从澳门发出了一封书简，为中国传教区索取数学书籍。”<sup>⑥</sup>

## （二）有关汉学著作的写作情况

罗明坚。他曾为其《天主圣教实录》在澳门写给麦尔古里神父的信，见上述。其他的信件有：据“费书”载：“一五八三年以后作于中国之信札，……（2）在一五八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作于澳门。……（4）在一五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作于澳门。”<sup>⑦</sup>

## （三）有关“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它涉及到许多在华传教士。他们在信件中谈论它，参加辩论，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态度，发表自己的看法。

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 1559 - 1639年）神父。耶稣会士，葡萄牙人。1597年7月20日到达澳门。写过的书简有：据李向玉著《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载：“其遗著有：……3、写给缪尔（Christophe de Mürr）的《公开的书信》，第6页引有李玛诺致会长克洛德·阿夸维瓦书，1609年11月11日作于澳门。”<sup>⑧</sup>据“费书”载：“闵明我神甫《中华帝国史》著录有玛诺之信札两件：一为一六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澳门致菲律宾群岛罗萨尔·圣多明我（Rosaire de St. Dominique）教区区长甘（Charles Gan）神甫书；一为一六三九年六月四日致多明我士莫拉勒斯（de Morales）神甫书。兹二书皆答书，盖二神甫关于中国之礼仪问题，曾致书于玛诺也。”<sup>⑨</sup>

陆若汉（João Rodrigues Tçuzu, 1561 - 1634年）神父。耶稣会士，葡萄牙人。1614年到达澳门。到澳门及后来再到澳门的时候，他均撰文反对利玛窦的天主名称的汉译及传教策略。据“方书”载：“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由日本至澳门，立即与龙华民通信讨论在汉文中称天主的最适当名词。……在可否以‘上帝’与‘天’称天主的问题中，他激烈反对利玛窦的主张。”<sup>⑩</sup>据“费书”载：“一六一四年被逐后避居澳门，曾与龙华民神甫通信札，讨论汉文天主名称事。……其后诸年参加上帝、天主等类名称之讨论，颇不以利玛窦神甫采用之习惯为然。”其著述还有：据“费书”载：“一六三三年若汉重还澳门，于二月五日致耶稣会长的信札，又于十一月三十日致葡萄牙助理员信札，皆驳利玛窦神甫所采汉文名称天主之非。……毕嘉（第一一八传）[Jean - Dominique Gabiani, 1623 - 1696年]神甫谓陆若汉神甫曾于一六一八年在澳门发表一文，辩驳利玛窦神甫等劝导华人入教方法之非。标题作《只懂日语，不顾种种困难泛学汉语》。……此外又引有《驳澳门编写的一部雄辩著作，它反对利玛窦及其在华追随者的行动，并反对费乐德神甫对原著的注释》。”<sup>⑪</sup>

#### (四) 介绍中国情况、研究中国历史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 (Fernão Mendes Pinto, 1509 - 1583 年)。旅行家, 耶稣会士, 葡萄牙人。《远游记》的作者。1555 年 11 月 20 日在澳门写了《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给巴尔塔扎尔·迪亚斯神父的信》。<sup>③</sup>在信中提到了浪白溜、阿媽溜、上川岛等地。

曼努埃尔·特谢拉 (Manuel Teixeira, 1536 - 1590 年) 神父。耶稣会士, 葡萄牙人。1563 年 7 月 29 日到达澳门。1563 年 12 月 1 日他写了《曼努埃尔·特谢拉神父给果阿耶稣会士们的信》。<sup>④</sup>在信中, 他介绍了澳门港、广州港的情况和中国政治制度。1565 年 12 月 1 日, 他写了《曼努埃尔·特谢拉神父给欧洲耶稣会士们的信》。据“罗书”载: “曼努埃尔·特谢拉神父在这封信中对澳门这个葡萄牙人居留地的早期生活作出了一整套重要的观察, 并补充了一些有关他在广州之行中收集到的有关中国的详细情况。”<sup>⑤</sup>

弗朗西斯科·佩雷斯 (Francisco Peres, 1514 - 1583 年) 神父。耶稣会士, 葡萄牙人。1563 年陪同葡使到达澳门。1564 年 12 月 3 日, 他在澳门写了《弗朗西斯科·佩雷斯神父给路易斯·龚萨维斯神父的信》。在信中, 他介绍了澳门的一些情况及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参加平定拓林兵变的情况。这些史实涉及到澳门的早期历史。据“罗书”载: “在下面转录的一封信中, 这们神父谈到了他在澳门停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 特别提及有名的同中国海盗作战的事件, 这事件常常有人毫无理由地把它说成是这个葡萄牙人居留地的起源。”<sup>⑥</sup>

费尔南·马丁 (Fernão Martin, 1545 - 1604 年)。葡萄牙人。1584 年在澳门。据“荣书”载: “我们列入此人是由于他于 1593 年 1 月 15 日自澳门发出了一封有关中国的书简。”<sup>⑦</sup>

迪奥戈·平托 (Diogo Pinto, 1544/1548 - 1618 年) 神父。耶稣会士, 葡萄牙人。其书简有: 据“荣书”载: “他于 1611 年 1 月 24 日从澳门发出了一封有关中国的书简。”<sup>⑧</sup>

#### (五) 其他不知其详细内容的

佩德罗·戈麦斯。据“荣书”载: “他 1581 年 10 月 25 日自澳门发出了一封书简。”<sup>⑨</sup>

瓦伦廷·(德)·卡瓦略 (Valentim de Carvalho, 1559 - 1630 年) 神父。耶稣会士, 葡萄牙人。据“荣书”载: “1596 年到达澳门, ……1615 年 1 月 15 日从澳门发出了一封书简。”<sup>⑩</sup>

曼始埃尔·加斯帕尔 (Manuel Gaspar, 1554 - ?) 神父。耶稣会士, 葡萄牙人。据“荣书”载: “他于 1603 年 1 月 15 日从日本出发前往澳门。他于 1611 年 2 月 10 日从澳门发出了一封书简。”<sup>⑪</sup>

卡米洛·迪科斯坦佐 (Camillo di Costanzo, 1571 - 1622 年) 神父。耶稣会士, 意大利人。1603 至 1604 年间到达澳门。他曾在澳门研究中国与日本宗教。据“荣书”载: “我们引用此人是因为他于澳门定出了 1617 年中国传教区的年度书简报告。”<sup>⑫</sup>

艾儒略 (Jules Aleni, 1582 - 1649 年) 神父。耶稣会士, 意大利人。1601 年抵达澳门。据“费书”载: “……一六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澳门致马吉尼 (Magini) 书。”<sup>⑬</sup>

卢安东 (Giovanni Antonio Rubino, 1578 - 1643 年) 神父。耶稣会士, 意大利人。据“荣书”载: “他仅仅于 1639 年 11 月 2 日经过澳门并从那里发出了书简。”<sup>⑭</sup>

### 三、撰写有关中国传教情况的报告及其他内容

许多传教士除在中国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传教情况的报告外, 还有一些诸如“禀帖”、“具揭”一类的作品。

郭居静 (Lazare Cattaneo, 1560 - 1640 年) 神父。耶稣会士, 意大利人。1593 年到达澳门, 在此研究汉语。据“费书”载: “一五九四年入华。……已而被召至澳门, 研究华语。”<sup>⑮</sup>他在澳门写下禀

帖一封。据“费书”载：“华文禀帖一件，一六〇六年澳门刊本，此乃上呈中国官吏之文，自辩其无谋逆行为者。”<sup>⑥</sup>

李玛诺。1597年7月20日到达澳门。他可能在澳门写过《中国年报》。据“费书”载：“有人谓一六一九年十二月七日作于澳门之《中国年报》及一六二六年三月一日作于嘉定之相类年报，并出玛诺手笔。”<sup>⑦</sup>

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 1571-1618年）神父。耶稣会士，西班牙人。1599年抵达澳门。他可能有一部著作刊于澳门。据“费书”载：“《辨揭》一卷，一六一六年仇教时所上之辨揭也。疑在一六一八的刻于广州或澳门。”<sup>⑧</sup>该《辨揭》亦称《具揭》。据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称：“庞迪我、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等所上之奏疏也。……此具揭辩论仇教者之诬亡，俾人明知天诸教与教士之真相。此揭共有二十一解，当时仇教之思想，……。”<sup>⑨</sup>

王丰肃。据“费书”载：“《一六一六年中国年报》，作于澳门，题一六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刻于诸汇编及《日本、中国、果阿和埃塞俄比亚信札》中，……此年报叙述一六一七及一六一八年间南京仇教事甚详。另有一六一九年一月六日自澳门致耶稣会长之意大利文记录，作为年报附录，亦述南京仇教事。”<sup>⑩</sup>

祁维材（Wenczlás Pantalén Kirwitzer, 1568-1626年）神父。耶稣会士，波希米亚人。1619年7月15日到达澳门。他在澳门撰有：据“费书”载：“《一六二〇年中国报导》，一六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写于澳门，署名作祁维材，一六一九、一六二〇、一六二一年中国大事报道，一六二四年。……《一六二四年中国书信》，一六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写于澳门，见《一六一六年西藏书信》和《一六二四年中国书信》，八开本，罗马，科尔伯洛蒂。”<sup>⑪</sup>

#### 四、其他活动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之外，这个时期的传教士们还进行了以下一些活动：

##### （一）进行科学调查

艾儒略。他曾于1611-1612年在广州观察了一次月蚀，在澳门撰写了观测报告。据“费书”载：“《一六一二年十一月八日日蚀之观测》，见《科学院论文集》卷七，七〇六页。是编撰于澳门。”<sup>⑫</sup>

##### （二）研究中国的历史与宗教

卡米洛·迪科斯坦佐。1603至1604年间到达澳门。他曾在澳门研究中国与日本宗教。据“荣书”载：“在1614年仇教时遭放逐，又回到了澳门，他在澳门研究了日本和中国的宗教。……还应提一下他曾研究过中国宗教的事实。”<sup>⑬</sup>

##### （三）绘制中国地图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传教士们绘制了一批中国地图。这些地图是在中国旅居多年的耶稣会士绘制，由于他们懂天文，识地理，精计算，善测量，又能阅读中国的地理图籍，所以他们绘制的地图水平较高，亦更为科学。目前所知，利玛窦首先在澳门研究、绘制中国地图。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后不久，在参考中国图籍的基础上，用拉丁文撰写了长文《华国奇观》，文后附有一张他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当时，欧洲制图家们正对中国舆图进行勾画。在此基础上，利玛窦还在中国的其他传教地绘制了地图。1584年，他在肇庆绘制了《万国舆图》。同年9月13日，他又把《华国奇观》一文以西班牙文重新编订于一封信中，由肇庆寄往欧洲友人，其中附有中国原式的各省分图。<sup>⑭</sup>

综上所述，明朝中后期，在天主教传入中国后，一大批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以澳门为基地，开始了澳门的汉学活动，使这个时期成为澳门汉学活动的发轫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活动主要有指定介

绍中国情况的著作；通过书信向西方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撰写有关中国传教情况的报告等及进行社会调查、科学调查等。这些都为西方汉学的发展，亦为以后澳门后来的汉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如有张西平著《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汉学研究》第4集；[葡]阿雷斯塔(António Aresta)著《葡萄牙汉学回顾》，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6-37期；吴志良著《十六世纪葡萄牙的中国观》，载《世界汉学》第1期等论文；刘澍冰著《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等学术专著。

②澳门汉学活动明显地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明代中后期天主教传入中国到明末。第二个阶段，从清初到18世纪70年代。在这两个阶段，在澳门活动的汉学家是一批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第三个阶段，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在这个阶段，在澳门活动的汉学家，除少数天主教传教士外，主要以新教——基督教传教士为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及其他人士。第四个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辛亥革命，在这个时期，汉学家以澳门人及世俗人士为主。

③该文收录在[葡]罗露露著《澳门寻根》(下称“罗书”)，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年，第106-128页；引文见同书第106页。

④参见[法]费赖之(Le P. Louis Pfister)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下称“费书”)，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7传《罗明坚》第23-24页。

⑤见[法]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1月，第373传《佩德罗·戈麦斯》第277页。

⑥见“费书”上册第51页。

⑦见利玛窦著《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台湾光启社，1986年，第113页；转引自张西平著《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下称“张文”)，载于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4集，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191页。

⑧该校后被利玛窦称为“圣玛尔定经言学校”。见利玛窦著《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台湾光启社，1986年，第432页；转引自“张文”，第192页。

⑨⑩见“张文”第192、207-208页。

⑪见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第182页。

⑫见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66页。

⑬此两处引文见《利玛窦通信集》，台湾光启社，1986年，第427、447页，此处转引自“张文”第207页。

⑭见上述及“荣书”下册第731传《罗明坚》第584页。

⑮⑯⑰见[葡]文德泉著《四百周年——澳门印刷业》，载澳门文化学会编辑出版《文化杂志》(中文版)第6期第6-7、7、6页。

⑱⑲见“费书”上册第9传《利玛窦》第40、32页。

⑳见“方书”上册《利玛窦》传第78页。

㉑见“费书”上册第21传《高一志》第94-95页。

㉒见“方书”中册《陆若汉》传第35页。

㉓见“荣书”第362传《奥尔甘蒂诺·涅奇——索尔多》第267页。

㉔见“费书”上册第11传《孟三德》第51页。

㉕见“荣书”上册第566传《梅尔肖尔·莫拉》第446页。

㉖见“荣书”下册第798传《米格罗·苏亚雷斯》第638页。

㉗见“荣书”下册第596传《穆其奥·罗基》第552页。

㉘见“费书”上册第7传《罗明坚》第29页。

㉙见李向玉著《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年7月，第134页。

㉚见“费书”上册第15传《李玛诺》第80页。

㉛此两条引文均见“方书”中册《陆若汉传》第34页。

㉜此两处引文见“费书”上册第71传《陆若汉传》第217-218、220页。

㉝②③见“罗书”第53-59、81-87页。

㉞该信收录于“罗书”第132-138页；引文见同书第132页。

㉟该信收录于“罗书”第100-105页；引文见同书第100页。

㊱见“荣书”上册第521传《费尔南·马丁》第413页。

㊲见“荣书”下册第641传《迪奥戈·平托》第507页。

㊳见“荣书”上册第373传《佩德罗·戈麦斯》第277页。

㊴见“荣书”上册第152传《瓦伦廷·[德]·卡瓦略》第115页。

㊵见“荣书”上册第353传《曼努埃尔·加斯帕尔》第259页。

㊶见“荣书”上册第219传《卡米洛·迪科斯坦佐》第160页。

㊷此两处引文均见“费书”上册第39传《艾儒略》第141页。

㊸见“荣书”下册第729传《卢安东》第581页。

㊹②③见“费书”上册第15传《郭居静》第57、62页。

㊺见“费书”上册第20传《李玛诺》第81页。

㊻见“费书”上册第19传《庞迪我》第76页。

㊼见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耶稣会创立四百年纪念(一五四〇年——一九四〇年)》，中华书局，1989年1月。

㊽此两条引文均见“费书”上册第20传《高一志》第94、96页。

㊾见“费书”上册第48传《祁维材》第167页。

㊿此两处引文均见“费书”上册第39传《艾儒略》第141页。

①见“荣书”上册第219传《卡米洛·迪科斯坦佐》第160页。

②参见吴孟雪、曾丽雅著《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72页。

责任编辑：杨向艳